

武漢營研習心得報告

黃庭碩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

2017年第七屆兩岸研習營由武漢大學承辦，主題為「荊楚文化」。整個課程扣除報到日(8/12)及返國日(8/23)外計有十天，其中包含四個田野考察日(8/15-18)、五個聽講日(8/13-14.19-21)，以及一天湖北省博的參訪(8/22)。在報名之初，本來預想這應當是一個比較偏向介紹上古秦漢之荊楚文化的營隊，沒想到實際收到課程教材後，才赫然發現明清的比重遠比想像來得高得多，雖然有些同學難掩失落，不過由於我本身對於上古秦漢史的涉獵也不太深，所以將重心轉至明清，對我來說反倒沒有太大的差別，因為同屬相對陌生的領域，於是便抱持著學習與觀摩的心態，來到了這個營隊。

由於我在2015年的夏天有參加過第五屆南京營的經驗，本以為自己應當可以輕車熟路，沒想到實際參與後才發現，相較於南京營，武漢營實在要讓人疲累得多。一個主要原因是，田野考察並不像南京營那般是與聽講日交錯安排，而是集中在中間的四天。且整趟路程自武漢始，沿漢水溪上，經鍾祥、襄陽，至武當山；回程則東巡至隨州，才又南返武漢，來回全程近900公里。也因如此，這四天都花了相當多的拉車時間，在體力上面已是一大考驗。復次，本次負責編纂教材的徐斌老師，具有極為豐厚的田野經驗，因此整趟路程基本上都是由他精心設計的田野點，所以抵達之後，學員們立即就得切換成田野模式，進入考察狀態，這也讓我們的考察活動異常精實，少有喘息餘地。

儘管田野體驗相當辛苦，不過也第一次見識到了久聞的「華南學派」的治學方法。此次研習營中，有多位老師都與「華南學派」有著緊密的連結，比如說徐斌老師、張侃老師，甚至是祖師爺等級的鄭振滿老師都親自登臨，使得考察的過程充分體現了外人對「華南學派」的田野概括——進村找廟、進廟找碑。而幾位老師們，總是能在短時間中，就所採集的文字材料，與既有的歷史框架、文本知識相繫聯，進而迅速推斷、重構出某一據點的形成史，乃至相鄰區域的人群互動。比如老師們在鍾祥的元祐宮中的銅鐘上，發現了明清之際重興此宮的陳真一之重要背景，從而判斷此宮的重建，可能與地方官員為了安置明清之際的流民集團有關。而後，同學們也學習了這個方法，考察顯陵外的大石碑，再結合傳世文獻中的記載，抽絲剝繭地逐漸勾勒出顯陵興建後對原地域社會帶來的諸般影響。這種種對於社會組織、人群互動的討論，都是我熟悉的中古史較難觸及的，因此儘管個人距離真正的田野考察仍很遙遠，但仍從中得到了諸多思考社會史的靈感。

講授課程的部分也相當有意思。事實上，在聽完幾講次後，我們很快便發現每位老師的講演基本上都帶有很強烈的「命題作文式」傾向。也就是說，各位老師基本上都被限定在「湖北」這個舞台下，設法結合自己專擅的領域，各自提出對於「湖北」地區或「荊楚文化」之觀察，例如王汎森老師從思想史、王銘珂老師由族群史、鄧淑蘋老師從玉器文化、胡曉真老師由文學史、鄭振滿老師從基層社會史、陳偉老師由楚簡研究，李豐楙與劉苑如老師則從宗教史等；另外，也有自身研究便集中在此區，特別接地氣的講題，像是余西云老師的江漢考古，以及楊國安老師的鄂東宗族研究。然而，不論是直接或間接與湖北這塊地域有關，每位老師都能帶進自己龐大的知識體系，從中提煉出饒富興味的論點。這種學術上的示範，對我來說具有與田野經驗同等重要的啟發意義。

最後要捫心自問的是，經過了十二天的研習營，我是否對所謂的「荊楚文化」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呢？答案或許是若有似無。有的部分是，在整個考察過程中，我們確實看到了湖北有別於其他區域的地貌、人群，乃至於文化，而地域文化的多樣性，早已是中國史的常識，是以這些印象與感悟某種程度提供了我建構湖北之地域特色的素材；無的部分則是，在研習營其間的討論中，我們又不斷地再重新省視「荊楚文化」的本質與邊界，我們看到有許許多多的人群在裏頭流動，即便是在湖北這個區域內部，也可以再行區分出幾個次區域，在這樣的思考中，我們又不知不覺地解構了某種本質式的「荊楚文化」。所以，「荊楚文化」究竟是什麼呢？現在的我還沒有答案。

所幸，王鴻泰老師曾在最後一天的討論提到：假使我們參加完這個營隊，可以很確切地向別人說明「荊楚文化」的內涵，某種程度就代表這個研習營失敗了。就此而言，沒有答案，應該就是最好的答案吧。未來我將會把這個問題持續放在心裡，希望有天我也能像研習營的老師們那樣，憑藉著自己的學術眼光，觀察出「荊楚文化」的特質！